

过度阐释：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接受的主体性研究

Overinterpretation: Subjectivity in Acceptance of Bakhtin's Polyphonic Novel Theory

叶 林 (Ye Lin) 姚婷婷 (Yao Tingting)

内容摘要：任何文学理论的阐释都离不开接受者的主体性，阐释主体往往会根据自身需求，对所接受理论的某个侧面进行“为我所用”的彰显，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接受就是如此。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解冻文学”时期的苏联文艺学界、60 年代下半期转向解构主义的法国符号学界以及 80 年代初改革开放的中国学界，对该理论进行过三次主体性极强的，甚至是过度的阐释，凸显了该理论的“对话”思想。事实上，从巴赫金本人的著作和一些史实材料分析来看，“复调”、“对话”是“在艺术构思的范围内”展开的，“多声部”必然是服从于主旋律的。“复调”结构的深层根源是东正教的“聚和性”，即“和而不同”。“和”是前提，是主旋律，绝对的“对话”是不存在的，“对话”的目的是为了“和”。本文通过还原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本来面目，为国际学界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认识，对巴赫金其他俄苏文学理论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巴赫金；复调；阐释；主体性

作者简介：叶林，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博士后，主要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姚婷婷（通讯作者），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皖江工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符号学和翻译学研究。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5ZD09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Overinterpretation: Subjectivity in Acceptance of Bakhtin's Polyphonic Novel Theory

Abstra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any literature theor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receiver's subjectivity. The interpretive subject often manifests a certain aspect of the accepted theory according to his own needs, such as the acceptance of Bakhtin's polyphonic novel theory. The Soviet literature and art circles in the period of "unfreeze literature" from 1950s to 1960s, the French semiotics turning to the period of deconstruction from later 1960s to early 1970s, and the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in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since early 1980s, have

once conducted overinterpretation three times on Bakhtin's polyphonic novel theory and especially stressed its "dialogism." According to Bakhtin's works and some historical material, "polyphony" and "dialogism" are actually performed within the conception of poetic, and "multi-voice" is inevitably subject to the theme of a certain literature. "Polyphonic" structure stems from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of Orthodox Church, which means being integrated while remaining different. "Integration"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precondition and the theme in polyphonic structure. There exists no absolute "dialogism" as one makes a dialogue for the sake of "integra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restore Bakhtin's polyphonic novel theory in order to provide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theory and other Soviet-Russian literary theories of Bakhtin.

Key words: Bakhtin; polyphony; interpretation; subjectivity

Authors: Ye Lin, Ph. D., is Postdoctoral Fellow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His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Russian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Email: yl09034@aliyun.com). Yao Tingting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Doctoral Candidat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She is also Associate Professor at Wan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31, China). Her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ranslation and semiotics (Email: Karen1020@aliyun.com).

任何文学理论的接受和阐释都与接受者的主体性密切相关，主体性的过度阐释往往影响着学界对被阐释对象的理解，甚至会导致一定的误读。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的接受就存在着过度阐释的问题。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该理论就引起了我国文艺学界的密切关注，《外国文学评论》等杂志多次发文展开讨论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已经深刻影响了整个东西方学术界。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问题不断涌现，甚至难以解决。比如，巴赫金作为一位提倡“对话”的思想家，却很少与别人“对话”。20 世纪 20 年代，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Проблемы творчества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1929）一书，在巴赫金及其同伴撰写的其他著作中，为什么“对话”和“复调”的思想几乎很少反映。巴赫金一生只对涉及复调理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一书

1 《外国文学评论》自创刊号起就多次刊登研究巴赫金的论文并展开讨论，参见钱中文、宋大图（1987 第 1 期），黄梅（1989 年第 1 期）、钱中文、张杰（1989 年第 4 期），吴晓都、夏忠宪（1995 年第 1 期）等。

做出修改并重新再版¹，其原因究竟何在？

当然，我们可以将巴赫金本人孤僻的性格²与其相对开放的理论思想分别看待。其实，学界就此也早有讨论，甚至有学者开始质疑，在20世纪20年代，巴赫金与瓦·尼·沃洛希诺夫(Волошинов В. Н.)、巴·尼·梅德韦杰夫(Медведев П. Н.)等合著的书，并非出自巴赫金之手。但，当巴赫金本人多次被问及著作权问题时，他虽不愿过多解释，却明确表示这些著作确实出自自己笔下，这一点在鲍恰罗夫(Бочаров С. Г.) 1974年11月21日与巴赫金的谈话记录中就有记载³。在莫尔托瓦大学与巴赫金一起共事25年的孔金(Конкин С.С.)，在《米·巴赫金：生活与创作之页》(Михаил Бахтин страницы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1993)中，通过分析这些著作与巴赫金在学术思想上的一致性后，指出：“在这种合作上，对全书具有决定作用的话语只属于其中一位，就是——米·巴赫金”(Конкин & Конкина 134)。

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中提出的“复调小说理论”及其“对话”思想，为什么会与巴赫金同时代的其他著作的话语风格如此不同呢？在我们对巴赫金“复调”、“对话”思想的认识中，是否存在“为我所用”的过度阐释呢？本文将依据巴赫金本人的著作和一些史实材料，从思想和宗教文化渊源等方面，对“复调小说理论”及其“对话”思想，进行重新阐释，还巴赫金“对话”思想以本来面目，为国际学界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认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阐释的主体性：“为我所用”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才逐步得到学界关注。1961年6月，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柯日诺夫(Кожин В.В.)、鲍恰罗夫等专程赶到萨兰斯克，在摩尔托瓦大学与巴赫金会面。巴赫金第一次在苏联学术界受到如此重视，并获得高度评价。此后，巴赫金接受他们的建议，着手修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并在柯日诺夫的帮助下，将此书更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Проблемы поэтики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于1963年再版。

巴赫金理论被发掘似乎纯属巧合，是柯日诺夫偶然阅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其实，这又是与当时苏联的意识形态环境息息相关的。在斯大林死后，1954年，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对《苏联作家协会章程》(Устав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1934)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修订，即删除了“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

1 1963年再版后更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Проблемы поэтики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2 参见严志军、张杰：“苏俄文艺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与变形”，《江海学刊》4(2013)：194-199。

3 参见钱中文：“理论是可以常青的——论巴赫金的意义”，《巴赫金全集》第1卷，钱中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12。

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СССР 13）。大会同时删去了“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去描写现实”中的“历史地、具体地”，后来在 1959 年的第三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才恢复了这两个副词（张杰，《20 世纪俄苏文学批评理论史》6）。1954 年的《章程》修订标志着苏联文学的新探索。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确立了反对个人崇拜的主张，同年在苏联文艺界开展了艺术审美本质的大讨论，文学批评开始关注文学创作的审美功能。1957 年 4 月和 1959 年 3 月，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与苏联作家协会先后共同举办了“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Проблемы реализма в мир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Проблемы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реализма）学术研讨会。这两次会议对现实主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也对文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现象进行了批评，推动了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审美转向。

1956 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 75 周年之际，苏联文艺界展开了关于该作家创作的大讨论。各主要报刊杂志几乎均发表了纪念文章，充分肯定了这位 19 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相关重要论文被收录成集，1959 年由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¹ 这次大讨论反映了苏联文艺学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评价的积极转向，以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开放态度。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² 时代环境的巨变必然会导致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深刻变革。在这场变革中，苏联文艺界急需寻找到一种理论思想，为文学的审美研究提供有效的方法，为思想解放开辟新的途径。巴赫金提出的“复调”、“对话”等思想，正好迎合了这一时代需求。因此，巴赫金的学术思想才得以在苏联学界被发掘和推介，其中顺应学界需求的理论被突出甚至加倍放大，而不合时宜的部分则被忽视和遮蔽。这实际上与当时苏联文艺界解放思想的需求、文学批评话语的变化等是密不可分的。究其根本，则是因为任何思想的阐释和接受都无法避免接受者自身的主体性限制，而主体性的不同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会导致理论或思想的不同阐释。总之，学界对巴赫金的学术思想进行过三次重大阐释，第一次阐释正是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的苏联，是带有苏联学术界主体性的“为我”阐释与理论“重构”。这一阐释虽然带有一定的主观片面性，但在学术“解冻”时期，为苏联文艺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框架内的文学创作研究，提供了新的审美批评方法，促进了学界思想的解放，把文学艺术形式的研究引向深处。

巴赫金真正赢得世界声望，还是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下半期。当时，法国学者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把巴赫金介绍到了法国，引起了

1 参见 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м. А. М. Горького АН СССР: «Творчество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9) 546.

2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欧洲学界对巴赫金的关注。1966年,这位年仅25岁的青年女性在巴黎举办的“话语的语言学:罗兰·巴特研讨班”(Le séminaire de Roland Barthes: La linguistique du discours)上,以“词、对话和小说”(Le mot, le dialogue et le roman)为题,对巴赫金学说进行了介绍。克里斯蒂娃按照自己的逻辑与需求,对巴赫金学说进行了理论改造,实现了对结构主义的超越,并首次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这篇论文发表在1967年的《批评家》(Critique)杂志上。¹ 克里斯蒂娃对巴赫金思想的改造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巴赫金对她的影响“已经内化到她的学术思想内部,成为其思维方式了”(曾军 194)。在巴赫金思想的基础上,克里斯蒂娃及其理论向解构主义转型,提出以“多元逻辑”和“边界门坎”为代表的文化理论思想。巴赫金学说之所以被克里斯蒂娃关注,并受到欧洲学界的欢迎,这也与“为我所用”的阐释主体性关系密切。其主体性根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思想界的深刻变革。20世纪60年代法国等西方国家知识界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日益增长。特别是在1968年爆发的法国“五月风暴”² (Mai 68)被镇压以后,思想界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打破中心和结构的理论。巴赫金的“复调”、“对话”、“狂欢化”等思想恰好契合了这种需求,为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的过渡提供了理论条件。

1995年,卡米尔·艾里-穆阿里(Camille Ally-Mulally)曾受《对话·狂欢·时空体》(Диалог карнавал хронотоп)杂志委托,在巴黎对克里斯蒂娃进行了采访。采访中,克里斯蒂娃承认,她一开始就将预先设计好的“曲解”带入了对巴赫金的接受之中,并在“对话”、“对话主义”之后引入某些她认为必需的新概念——“互文性”(克里斯蒂娃 214-224)。可见,克里斯蒂娃也承认了自己阐释的主体性问题。

显然,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苏联学界对巴赫金的第一次阐释所表现出的主体性,是基于苏联文艺界由意识形态本质论朝着审美本质论的转向。到了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法国学界对巴赫金的第二次阐释所表现出的主体性,则是根源于西方文艺学界由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的过渡。

巴赫金思想的第三次重大阐释,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三至四年间,巴赫金理论开始在中国学界被介绍和传播。首先是钱钟书关注到巴赫金的文艺思想。19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100周年,夏仲翼在《苏联文学》1981年第1期上,发表了论文《窥探心灵奥秘的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散论〉》。该文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做了简介,并在注释中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

1 参见 Kristeva J, “Bakhtine, le mot, le dialogue et le roman.” Critique 23 (1967): 438-465.

2 五月风暴(Mai 68)是1968年5月至6月在法国爆发的一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群众运动,反映了由于整个欧洲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而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的诗学问题》(Проблемы поэтики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1963)。¹不久,关山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一些情况》一文中,正式谈到了巴赫金和该书。²《世界文学》在1982年第4期上推出的一组文章对早期的巴赫金研究影响最大,即夏仲翼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第一章的翻译和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³等。

巴赫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联系在一起的。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带来了社会思想的大解放,也突破了文艺界研究的禁区。改革开放后,各种西方文论相继被引入国内,其中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及其对话思想,为学界带来了文艺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由此可见,中国学界对巴赫金思想阐释的主体性也是十分清晰的,也是为我所用的。当然,这种主体性阐释推动了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60年代下半期、80年代初的三次重大阐释,分别推进了苏联艺术审美本质论的转向,欧洲向解构主义的过渡,以及中国的思想解放,对国际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这三次过度阐释又难免会造成对巴赫金的学术思想阐释的偏颇,未能完整展示其思想原貌。

二、修订的适时宜:“去历史化”

从巴赫金的一生来看,他是一位主观性极强的思想家。在长达80年的生活中,他很少与人交流,性格孤僻,难得修订自己的学术著作,只对反映其“对话”思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进行过再版。为什么巴赫金偏偏会修订这本书呢?

这是与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社会意识形态环境剧变密切相关的。苏联美学家亚·伊·布罗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Буров)在1956年出版了《艺术的审美实质》(Эстетическая сущность искусства),引发了学界艺术审美本质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无疑与当时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突破理论和思想禁区的需求分不开。在50年代以前,苏联文艺界主要坚持的是意识形态本质论,而到了“解冻时期”才真正转向艺术审美本质的探究。

为了让自己的著作更适应时代的需求,巴赫金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做了部分的修改。他删去了不少与社会历史批评相关的部分,凸显了复调和对话,彰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艺术构造,以便更契合艺术审美本质论的转向。该书的再版就是充分实践了艺术审美本质的美学思想。

然而,被删节的部分恰好反映出巴赫金最初创作中对历史维度的思考。

1 参见夏仲翼:“窥探心灵奥秘的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散论”,《苏联文学》1(1981):132-136。

2 参见关山:“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一些情况”,《外国文学研究》3(1981):142-143。

3 参见夏仲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世界文学》4(1982):105-115。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的开头，被删节了“一切历史问题我们都排除不谈（……）相反，我们认为，每一个理论问题均须作历史的考察。在文学作品研究的共时方法和历时方法之间，应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严格的彼此制约”（巴赫金 358）。这里，巴赫金其实承认了文学体裁的研究离不开历史维度的考察，甚至表示“我们随时都考虑到了历史的角度（……）历史的角度成了我们感受所研究的每一现象的背景”（巴赫金 358）。再版时，删除这些语句明显是为了突出研究的艺术维度而弱化历史维度。

尽管再版中许多关于历史维度的论述遭到删节，但纵观巴赫金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创作，不难发现巴赫金学术思想总体呈现出社会历史的特征。这一特征在巴赫金同时期的其他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Формальный метод в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и*, 1928）、《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Фрейдизм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1927）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Марксизм и философия языка*, 1929）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也未脱离自身创作的总体特征而标新立异，这可以从全书另一处被删除的部分看出：

作为本书分析的基础的，是这样一种认识：任何文学作品本身内在地都具有社会性。作品中交织着各种活生生的社会力量，作品形式的每一要素无不渗透着活生生的社会评价。所以，即使纯形式的分析，也应把艺术结构的每一要素看作活生生的社会力量的折射点，看作这样一个艺术的结晶体：它的各个棱面经过加工琢磨，都折射着各种社会评价，并且是在一定视角下的折射。（巴赫金 358-359）

巴赫金完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的写作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此时，布尔什维克已把工作的重点由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经济，转向对意识形态环境的关注。布尔什维克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执政党，坚持社会科学研究“社会性”和“历史性”。巴赫金的研究也不例外，他在该时期撰写的学术专著中，总会强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苏联社会意识形态环境的急剧变化，要求巴赫金及其研究者们必须适应这一新的历史潮流。因此，轻历史、重形式分析等就成了巴赫金重新修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的主导思想。为了显示文学的解冻，“复调”、“对话”、“狂欢化”、“时空体”、“未完成性”等关键词，频繁出现在巴赫金创作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论著之中，尤其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与《拉伯雷的创作以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民间文化》（*Творчество Франсуа Рабле и народная культура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и Ренессанса*, 1965）两部专著中。

巴赫金对其专著的修订和对“复调”思想的彰显，是为了迎合社会历史

环境的“被动修正”，还是为了“主动恢复”其受制于环境而未能表达的真实学术思想呢？弄清这个问题，需要从巴赫金著作出发，给予其思想相对客观的分析，并探究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渊源，从而还原巴赫金学术思想的本来面貌。

三、复调的主旋律：“和而不同”

关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学界引用最多的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基本特点的描述，即“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巴赫金 4）。“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复调小说的首创者。他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小说体裁”（巴赫金 5）。巴赫金在这里借鉴了音乐中“复调”或曰“多声部”的概念，以此来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结构，即主人公“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也是直抒己见的主体”（巴赫金 5），甚至可以与作者平等对话。主人公意识的独立性、主人公与作者的平等对话关系，被视为理解复调理论的关键，也是该理论延伸出“对话”思想的基础。

在复调或曰“多声部”作品中，通常有两条及其以上的独立旋律，通过技术处理，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不同的独立旋律是要交融成一个主旋律，并非脱离和谐的独立。巴赫金再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要人物，在艺术家的创作构思之中，便的确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也是直抒己见的主体”（巴赫金 5）。如果离开“艺术构思”前提，“对话”和“复调”是不可能的。任何复调音乐和人物平等对话都是艺术家有意安排的。作家是把争论中的每一观点都发挥到最大的限度，使之具有最强的说服力。在作家的精心策划下，不同话语的对话才形成一个拥有多声部的主旋律。

从作家的伦理身份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尽可能给自己的主人公以直抒己见的最大空间，让每一个主人公都可以从自己的伦理身份出发，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并通过自我内心或与他人之间的对话，实现伦理身份的自由选择，作家并不强迫主人公赞同自己的观点，而是使之成为与自己平等的对话者。在这里，作家进入了最高的伦理境界，给主人公以自由，而并非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如同一个高级的指挥家，站在自由伦理选择的舞台上，艺术地指挥着由各种观点交织而成的“交响乐”。显而易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主体性，是在复调小说的创作艺术中整体实现的。作家在创作中尊重主人公，甚至每一个人物，这本身就是一种高尚道德的体现。例如，在创作长篇小说《罪与罚》的过程中，作家让以“恶”抗“恶”的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与以“善”待“恶”的妓女索尼娅，从自身的伦理身份出发，均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似乎这时作家的声音只是其中的一种，处于平等之中。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实现了自己创作的伦理道德目标，即为创作和阅读争取了最大的自由。作家的主体性并非是某一个主人公的观点

或思想，而是不同声音碰撞中的和谐之音。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Диалог у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1929）一章被删节的部分来看，巴赫金确实充分肯定了作者创作的意向：“作者的创作意向所在，完全不是这些思想本身，不是某种中态的和一成不变的思想。不，意向所指，恰好是通过多种不同的声音展现主题，是这一主题原则上具有的，可以说很常见的多声性和歧声性。不同声音的配置方法本身及其相互作用，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至关重要的”（巴赫金 362-363）。“狭义上的思想，即主人公作为思想家的种种观点，也是根据上述的构建原则进入对话之中的”（巴赫金 363）。巴赫金在这里强调的是，主人公之间或主人公与作者之间的对话是服从于作家构建原则的，“多声性”和“歧声性”是展现主题的。实际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既不存在完全脱离作家艺术构思的平等对话，也不可能有不体现主旋律的“复调”和“多声部”。巴赫金的文学批评方法，特别是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也是呈现出“整体性”与“系统化”特征的（张杰，《复调小说理论研究》34-52）。

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创作是与19世纪俄罗斯社会历史环境息息相关的。巴赫金本人十分清楚这一点，只是故意回避了复调小说产生的思想和社会根源，以免落入社会历史批评的范式。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开头就指出：“本书论述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因之对他的创作，仅仅是从这个角度加以考察”（巴赫金1）。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及其小说“复调”结构的文化渊源和思想根源是不容忽视的。尼·亚·别尔嘉耶夫（Бердяев Н. А.）在论及俄罗斯文学的基本特征时，曾指出：“从果戈理开始的俄国文学成为一种训诫文学。它探索真理，并教示实现真理。俄罗斯文学不是产生于个人和人民的痛苦和多灾多难的命运，而是产生于对拯救全人类的探索。这就意味着俄国文学的基本主题是宗教的”（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63）。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俄罗斯人的独特精神建构并以自己的创作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东正教精神。他明确指出：“我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之子”（Бердяев, *Трагедия и обыденность* 144）。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是通过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简单地宣扬自己的伦理道德观点，而是通过作品的整体艺术效果，给人以高度的自由感，并由此来实现文学创作的伦理表达。这种表达既不是非此即彼的道德说教，而是多声部的包容、自我和他人的自由追求，从而实现心灵“救赎”。

当代东正教文学批评家叶萨乌洛夫（Есаулов И. 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中的东正教‘符码’是显而易见的”（Есаулов 130）。从文化渊源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复调”结构源自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聚和性”（*соборность*）。这是由斯拉夫派领袖阿·斯·霍

米亚科夫 (А. С. Хомяков, 1804-1860) 最早提出的。他认为: “‘собор’ (教堂) 这个词还有更一般的意义, 即这种集合的永久性观念, 换言之, 它体现了 ‘多样性中的统一’ 思想” (Хомяков 325)。“聚”就是指为了共同的信仰而聚集到一起, “和”是“和而不同”的“和”。这里体现了东正教的博爱精神, 即把不同的观点都聚集在一起, 只要信仰一致, 都应该包容。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 主人公之间或主人公与作者之间的平等对话, 是在艺术构思中展开的。“和而不同”中“和”是主旋律, 不同话语间的“对话”是服从于主旋律的。这种主旋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表现为“救赎”, 也就是从范围上来说, “救赎”他人、自我、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等, 从层次上来看, “救赎”外在世界、心灵, 追求精神的复活和理想境界等。例如,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中,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用暴力抗恶”与索尼娅的“勿以暴力抗恶”之间的对话, 其实都是服从于“救赎”这一主旋律的。“救赎”就是俄罗斯东正教精神本源之一的“弥赛亚”(Миссия, 拉丁语 *missio*) 意识的精髓, 也是俄罗斯文学创作的主要思想源泉之一。

任何理论的阐释都无法摆脱阐释者自身的主体性, 而社会意识形态环境又是导致理论阐释结果的重要因素。虽然理论界可以根据自我需求加以阐释, 而且有时这种主体性阐释有助于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但是还原理论的本来面目, 尽量避免过度阐释, 是研究必须持有的科学态度, 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研究也是如此。这种还原不仅不会颠覆对巴赫金“复调”理论及其“对话”思想的想法, 相反会让我们更加深入和全面地了解这一理论和思想, 更可以为我们对外国文学理论的接受和阐释, 提供值得借鉴的思考。

Works Cited

-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5卷, 钱中文编, 白春仁 顾亚铃译。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年。
[Bakhtin, Mikhail Mikhailovich. *The Complete Works of Bakhtin*. Vol. 5. Eds. Qian Zhongwen. Trans. Bai Chunren and Gu Yaling.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9.]
- Бердяе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0.
[Berdyayev, Nikolay Alexandrovich. *The Origins and Meaning of Russian Communism*. Moscow: Science Press, 1990.]
- , Трагедия и обыденность. Москва: Искусства, 1994.
[—, *Tragedy and Ordinary*. Moscow: The Arts Press, 1994.]
- Есаулов, Иван Андреевич. Категория соборности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5.
[Esaulov, Ivan Andreevich. *The Category of Sobornost in Russian Literature*. Petrozavodsk: Petrozavodsk UP, 1995.]
- Хомяков, Алекс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8 т. Т. 2. Москва: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1886.

[Khomyakov, Alexey Stepanovich. *Complete Works in 8 Vols. Vol 2*. Moscow: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1886.]

Конкин, Семен Семенович & Конкина Лариса Семеновна. Михаил Бахтин: Страницы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Саранск: Мордов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93.

[Konkin, Semen Semenovitch, and Konkina Larisa Semenovna. *Mikhail Bakhtin: Pages of Life and Work*. Saransk: Mordovian Book Publishing House, 1993.]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周启超: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谈米哈伊尔·巴赫金”,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1(2013): 214-224。

[Kristeva, Julia and Zhou Qichao. “About Mikhail Bakhtin.”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1(2013): 214-224.]

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СССР. Устав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СССР.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о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1935.

[Union of Soviet writers. *Charter of the Union of Soviet Writers*. Moscow: Soviet Law, 1935.]

曾军: “克里斯蒂娃接受巴赫金思想的多元逻辑”, 《文学评论》4 (2013): 188-196.

[Zeng, Jun. “Kristeva's Multiple Logic of Acception of the Bakhtin's Thoughts.” *Literary Review* 4 (2013): 188-196.]

张杰等著: 《20 世纪俄苏文学批评理论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Zhang Jie et al. *The History of Russian and Soviet Literary Criticism in 20th Century*. Beijing: Peking UP, 2017.]

张杰: 《复调小说理论研究》。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2 年。

[Zhang Jie. *A Theoretical Study of Polyphonic Novels*. Guilin: Lijiang Press, 1992.]